

批判雷海宗、李鴻哲
的反动史学观点

上海人民出版社

11(3)/21
542666



批判雷海宗、李鴻哲
的反动史学观点

70-06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58年

**批判雷海宗、李鴻哲
的反动史学观点**

*

上海人民出版社編輯、出版
(上海紹興路54号)

上海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001号

上海新华印刷厂印刷 新华書店上海發行所發行

*

开本787×1092公厘1/32 印張3 1/16 字數69,000

1968年11月第1版

1968年11月第1次印刷

印數1—3,000

統一書号：11074·167

定 价：(6)0.20元

封面設計：趙 晴

編者的話

最近,高等学校的师生,为了贯彻社会主义教育路线,正在进行资产阶级学术思想批判,編印本書的目的就是要配合这个运动。

雷海宗和李鴻哲是披着学术外衣的右派分子,他們借口反对教条主义来反对馬克思主义。他們用“生产工具决定論”来否定馬克思主义关于阶级斗争的学說,他們以否認奴隶制度的存在来推翻馬克思主义关于五种社会經济形态的学說。他們散布了大量的毒素。本書收集的三篇文章有力地駁斥了雷海宗、李鴻哲反动的史学观点,彻底揭露了他們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面貌,拔去了史学界的一面白旗。

1958年9月2日

目 录

揭穿雷海宗“世界史分期与上古中古史中的一些

問題”一文的反动的政治目的 …… 楊生茂 來新夏(1)

批判雷海宗和李鴻哲的否定奴隶制社会的謬論 … 刘家和(27)

批判李鴻哲反对五种生产方式学說的謬論 …… 葛懋春(61)

揭穿雷海宗“世界史分期与上古 中古史中的一些問題”一文 的反动的政治目的

楊生茂 來新夏

（一）剝落雷海宗“学术研究”的美丽外衣

1957年上半年，資產階級右派分子，乘党整風之機，發動了猖狂的進攻。他們用盡各種卑鄙陰險的手法來進行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反動活動，妄想實現其資本主义反革命復辟的目的。他們有的公開叫囂“殺共产党人”；有的狂妄地提出“政治設計院”，“平反委員會”以及反社会主义科学綱領等來篡奪党在国家各項事業中的領導權；有的則極為巧妙地用“学术研究”的美丽外衣装扮了自己來進行陰謀活動，資產階級知識分子中的右派分子有不少人是採用了這個卑鄙的手法。

資產階級知識分子中的右派分子的“学术研究”，不是真正的对学术的研究和探討，而只是他們的一種巧妙的隱蔽。我們知道，当全国各地正进行轟轟烈烈的宏偉的社会主义建設、全国劳动人民和革命知識分子都堅決拥护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制度的时候，他們是不敢明目張胆地出來表明自己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心思的，但是他們并不甘於斷絕這個念頭，于是他

們分別披上各色各样的专家外衣,在“学术研究”的幌子下,从各个角落进行复辟资本主义的阴谋活动。雷海宗在这个反动活动中扮演了一个重要而特出的角色。

雷海宗是一个具有二十多年反苏反共政治經驗的老牌右派分子。他一直是在“学术研究”外衣的掩飾下进行着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活动。1957年6月2日他在天津各社会科学学会学术講座上,以“世界史分期与上古中古史中的一些問題”为题所发表的講演^①,便是他进行阴谋活动的最有力的罪証之一。这篇論文不是什么“学术論文”,更不是百家爭鳴中的一家之言,而是一篇彻头彻尾的资产阶级社会科学向馬列主义进行恶毒攻击的宣言書;同时这篇文章也不是雷海宗的“学术心得”,而是蓄謀已久的反党反社会主义大进攻中的一个重要步骤,是他向馬列主义基本原理进攻达到猖狂頂点的一个标志。

雷海宗一貫仇視馬列主义。在苏共二十次代表大会以前,他的进攻的手法是极为隱蔽的。他別有用心地強調馬列主义难学和挑剔馬列主义經典著作譯文中的毛病,借以反对人們学习馬列主义。他說:“看馬、恩著作时,必須知道丰富的世界史資料,例如共产党宣言,头一句和最后一句就是从聖經来的,所以必須知道聖經。”实际上,这就是使人們对馬列主义望而却步,阻止人們对馬列主义的学习。匈牙利十月事件以后,雷海宗便認為时机已到,就跃跃欲試了。在党提出“百家爭

^① 見“历史教学”月刊7月号。

鳴”政策和准备开展整风运动以后，更使雷海宗情不自禁地手舞足蹈起来，开始公开地向党的方针政策以及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发动了全面进攻，漸漸地暴露了他的隱蔽已久的反动的真面目。

四月間，雷海宗在人民日报座談会上提出的“馬克思主义停滯在 1895 年”“补資本主义課”等謬論，是他公开向党进攻的第一支毒箭。这支毒箭是他經過深思熟慮、长期泡制而成的。在这之前，他就向人提出“馬克思主义在馬克思死时(1883 年)就停止了”和“馬克思主义在‘反杜林論’出版那年(1877 年)就停止了”等謬論。雷海宗鉴于馬列主义在我国深入人心并成为各項事业的指导思想而不敢公然否定，所以便采取了这一年或那一年“停止发展”的手法，从根本上推翻馬列主义。雷海宗的这个謬論曾得到社会上許多右派分子的喝采，南开大学历史系有些右派分子学生为此而鼓掌叫喊“雷先生把馬列主义推翻了”。一些思想模糊，認識不清的人也站出来支持和保卫雷海宗的这种謬論。右派分子譚天荣更把这个謬論引为自己进行反动活动的理論根据，并且还专誠拜訪，亲聆“教益”。在雷海宗看到“人民日报”編輯在他的謬論后面所加的按語后，他非但不肯認罪，反而故意挑撥党群关系，煽动别人对党的方针政策表示不滿。他曾对支持其謬論的人說：“‘人民日报’的作法，很使人伤心，你們还可以說話，我是不再說了，但我并不就为‘人民日报’的按語压倒了，以后在史学会講演时，我还要講。”这一点充分証明他在不久之后所发表的“世界史分期与上古中古史中的一些問題”的演講原是一个蓄意

进攻的行动。雷海宗更借“人民日报”按注之机，危言耸听，向党进行威胁。他说：“我自己没有什么，但是担心按语可能有三种坏影响：一是少数有学问的老年人不再说话了；另一些中年人还说话，但不说实话了；三是‘人民日报’传到外国去，胡适等人借题宣传，对留学生回国将有不好的影响。”看！雷海宗在这里施展了多么凶恶的政治讹诈的手段。

雷海宗是具有丰富的反苏反共政治经验的人，因此其反动的政治警觉性也非常高。“人民日报”的按语使雷海宗察觉自己底细被人识破，感到大势不妙，遂急忙退兵，转移阵地，于是他向人表示：“以后不再谈这个问题了，但是学术问题还要谈。”显然，以“世界史分期与上古中古史中的一些问题”为题的演讲正是雷海宗企图披着学术外衣，向党向社会主义继续进攻的新策划。

雷海宗非常重视他那篇演讲的效果的，他希望能够广泛地散播他所放出的毒素。在“历史教学”月刊发表该文之前，他作了一定的估计。他说：“这篇文章出来，一定舆论大哗。”并表示：“‘历史教学’销数多，对中学教师能解决些问题。”他在文章中也是作贼心虚地自供道：“我们下面很冒险地很担心地接触一下这个问题。”试问既是学术问题的探讨，何必要“冒险”而“担心”呢？演讲后，雷海宗进一步制定了下一步的进攻计划。他曾对赞成他演讲的人说：“我的演讲登出后，不知道反应如何？如果登出后，再有人反对，我准备再写两篇，一篇是有关费尔巴哈论的读书报告，一篇是有关自然辩证法的读书报告。”雷海宗的第三支毒箭正在满弓待发之际，不料反右派

斗争开始了。这个老牌右派分子的丑恶面目被識破了，他的反动的幻想遭到彻底的破灭。

剥掉雷海宗的“学术研究”的美丽外衣后，他的原形就毕露了。他原来是一个一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世界史分期与上古中古史中的一些問題”一文，原来是一支向党向馬列主义向社会主义进攻的毒箭。为了更清楚地認識雷海宗的本来面目，我們由他的文章中擇出几个問題来揭穿他的反动的政治目的之所在。

（二）雷海宗恶意誣蔑新中国的史学工作者， 企图挑撥党和知識分子的关系

雷海宗一向对社会主义社会科学表現着无比的仇視，对资产階級社会科学却一味粉飾和膜拜。尤其对于新中国在历史科学方面的巨大成就持有敌意，并用冷嘲热罵的語句和含沙射影的手法，向新中国史学工作者进行恶意的攻击。很显然，他的目的是一方面要打击以馬列主义研究历史的科学工作者，妄图改变我国社会科学的社会主义方向；另一方面要挑撥离間知識分子和党的关系，进以煽动对党对社会主义心怀不滿的资产階級知識分子起来反对党的领导。

“世界史分期与上古中古史中的一些問題”一文从头到尾浸透着发泄私怨和挑撥中伤的气味的。他不是善意地探討問題，而是对史学工作者的成就蓄意攻击，橫加抹煞。当然，在这方面雷海宗也是以伪装的姿态出現的。首先他装成謙虛达

理的学者，其次装成反对教条主义的斗士。

在文章的开端，雷海宗说：“他（指马克思——笔者）没有一点武断的口气，这是古今多数学者所共有的审慎谦虚的气度。越是懂得多的人，越知道自己懂得的事实很少，越感到自己所不懂得实在太多，态度自然就是审慎谦虚的。”在他的文章的结尾，他又说：“我们愿意提出一个主张：大家暂时不再多谈历史分期的问题。关于这个问题，不清楚的地方仍然很多，……欧洲史上没有解决的问题仍然多得很。我自己感到对欧洲史所知太少，今后想要努力加紧学习，使自己的认识能够少犯片面的错误，能够逐渐比较接近真实。”前一段文字推崇马克思的谦虚，后一段文字标榜自己的谦虚。我们说谦虚是一种美德，推崇马克思的谦虚精神也是应该的；但是，问题不在应否谦虚，而在雷海宗假谦虚之名，对史学工作者横加辱骂和攻击。难道以马列主义理论勤勤恳恳探讨历史分期的史学工作者们都是些妄自尊大、不学无术的人吗？这显然是对史学工作者的一个诬蔑。其实雷海宗不仅诬蔑了史学工作者，而且还有其不可告人的用心。事实是：前一段文字给他以“生产工具发展史”谬论偷换马克思社会经济形态学说这一行径打下埋伏；后一段文字是企图阻止史学工作者去研究历史分期问题。雷海宗一方面讽刺并反对我们研究历史分期问题，另一方面却假借马克思的社会经济形态学说之名贩卖“生产工具发展史”谬论。他的恶毒的用心不是昭然若揭了吗？假如雷海宗的阴谋得逞，难道不是马克思的社会经济形态学说被取消了吗？

我們進一步問，雷海宗是不是一个謙虛的人呢？不，远远不是。他曾經說：“自然科学方面，一开口就知道學問如何，而社会科学不一样。現在史學界領導都是外行，這問題很大，史學很难发展。不知道党中央是否知道，可能有两种情况，一是不知道，一是知道了沒有办法，因为这些人都是統战对象。”他說：“甲骨文的研究都是胡說八道。”在欢送毕业生会上，他說：“現在懂得历史的人太少了，如北京的一座大塔被拆掉，这是很不應該的，可見連北京这样的大城市，也沒有几个人是真正懂得历史科学的。”够了，仅仅引用这几句話就可以刻画出雷海宗的狂妄自大的形象了。由此我們更可識破雷海宗标榜謙虛的目的。他是以“謙虛”作为进攻馬列主义以及馬列主义史學工作者的掩护。难道这不是显而易見的事实嗎？

雷海宗經蔑史學工作者說：“为何在談与今天任何实际問題都无关系的一个历史問題，特別是奴隶問題，会有感情冒头，这恐怕是值得心理学家进行研究的的一个問題。”我們問，为什么雷海宗在談到奴隶制問題时，也是“感情冒头”呢？这到不是个“心理学”的問題，而是个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政治問題。

在“世界史分期与上古中古史中的一些問題”一文中，雷海宗另一向史學工作者进攻的方法是把自已打扮成反教条主义的斗士。他以反教条主义的姿态，对史學工作者进行了极其恶毒的进攻和誣蔑。他說：“大家都推崇馬克思，但推崇的标准究竟是什么，实在叫人迷惑。馬克思一句偶然的話，今日大可不必推敲的，我們往往千方百計地把它坐实；而馬克思經過研究、經過审慎思考所下的一个論断，我們却若无其事地

不予一顧——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他說：“我們學希臘史，是由歐洲人的地方學來的，自然地也就承受了歐洲人的錯覺，并且青出于藍，把這個錯覺進一步發揮，雅典擴大為希臘，希臘擴大為全世界，全世界必須要有雅典式的，最少是近似的奴隸制。象這樣的描空之作，在學術發展史上恐怕是很難找到第二個例的。”這些語句是多么極盡刻薄的能事！

其實雷海宗的目的不在反對教條主義，而在反對馬列主義。教條主義是主觀主義的一種表現，是同馬列主義水火不相容的。馬列主義者恰恰是反對生搬硬套馬列主義的個別詞句和結論，而是要求依照馬列主義理論的精神實質去分析具體問題，去解決具體問題。這樣，馬列主義永遠是生氣勃勃、不斷發展的。但是雷海宗把教條主義跟馬列主義等同起來，故意使人相信要反對教條主義，就要反對馬列主義。在他的文章中，雷海宗故意把以馬列主義理論進行歷史分期問題的研究跟教條主義混淆起來，使人相信要反對教條主義，就要反對馬克思社會經濟形態學說的研究。

雷海宗萬變不離其宗。無論採用什麼詞句，無論打出什麼招牌，他總是追求著一個目的——反黨反社會主義。他企圖以刻薄諷刺的詞句把馬列主義史學工作者罵臭，企圖以提倡謙虛和反對教條主義的招牌把馬列主義從歷史學這一科學部門中驅逐出去。雷海宗也知道歷史學是一門政治性非常強烈的科學部門，所以他妄想“搞垮”這門科學。他希望從這裡打開一個缺口，以實現其反辟資產階級社會科學以及資本主義制度的幻想。這種不自量力的想法和作法正說明雷海宗這

个右派分子是极端阴險的。

（三）雷海宗用“生产工具发展史”的謬論 来否定馬列主义階級斗争学說

雷海宗提出“生产工具发展史”謬論的手法是极为巧妙和隱蔽的。他一开始就窃用了馬克思“政治經济学批判序言”中有关社会經济形态的論述，套用了生产方式的名詞来掩盖自己的私貨——“人类社会的发展决定于生产工具的发展”的謬論。我們知道，馬克思解釋社会經济形态的发展，是从生产力 and 生产关系的发展、对立和統一的过程中来观察的。他把生产方式視作人类社会发展的主要的决定力量。可是雷海宗的生产工具决定論显然不是这样。由此可見，雷海宗之所以引証馬克思主义的論述只不过是為了把馬克思主义作为自己的进攻目标而已。

雷海宗的生产工具决定論，首先割裂了生产方式中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两个組成因素。他在說明社会发展的阶段时，千方百计地不談社会生产关系。他要把人类社会的发展說成是人同自然的关系，抹煞在生产过程中人与人的关系。事实上，生产关系是絕不容抹煞的。就在雷海宗所窃用“政治經济学批判序言”中的那一段話的前面，馬克思就指出：“人們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彼此間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們本身意志为轉移的关系。”^①換言之，为了进行生产，人們必須有一定的联系，唯有經過一定的社会联系，人才会有生产。如果

談社会发展而不談社会生产关系，就不会看到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在阶级社会里，也就是否定了革命，否定了阶级斗争。显然，这就是对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之一——阶级斗争学说的猖狂进攻。这就是雷海宗用心最毒辣之所在。

雷海宗不仅抹煞了生产方式中的生产关系，而且又抹煞了生产力中的人的因素。他说：“生产力中的人的因素，我们是否可以假定为当然的？是否可以不必在这上面多作文章？”这就是说，他认为生产工具就代表生产力。这又是他对马克思主义原理的再一次进攻。

誰都知道，劳动者在生产发展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列宁说：“全人类的第一个生产力就是工人，劳动者。”^① 我们可以想到，若是没有劳动者，工具就不能制造出来；生产工具若不被人用来进行生产，也是无用之物。正如马克思所指出，“不参加劳动过程的机器，是无用的，不仅如此。它还会在自然物质变化的破坏下解体。铁会生锈，木会腐朽，……它必须被活的劳动捉住，并从死梦中被唤醒，从只是可能的使用价值，变为现实的发生作用的使用价值。”^② 显然，掌握经验技术的劳动者是生产力中最重要的因素，而这些人也正是被剥夺被压迫阶级的人。雷海宗竟然抹煞了人的因素在生产力中的地位。这不是他企图以生产工具决定论来抹煞劳动人民在人类

① “马克思、恩格斯文选”两卷集，第一卷，苏联外国文书籍出版局中文版，第340—341页。

② “列宁全集”，第29卷，人民出版社1954年版，第327页。

③ 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第199页。

历史发展中的作用嗎？这不正是他否定阶级、反对阶级斗争学说的明証嗎？

我們再就现实生活来考察一下。如果生产力就是生产工具的話，那我們就无从解释新中国社会制度的优越性了。解放后，当我們国家的生产工具还没有显著的变更时，可是我們的社会生产力却有了很大的提高。这种情况主要是由于解放了的我国劳动人民，在党的领导下，在生产过程中积极地、創造性地發揮了他們既有的經驗技术。因此，这种只強調生产工具作用的謬論无异是怀有否定我国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政治目的的。

雷海宗是用否定經驗和技能的手法来否定生产力中的人的因素，借以突出生产工具在生产中的决定作用，因之，他把与发展生产工具有密切关系的經驗和技能說成是“很难捉摸的东西”。他在引証“簡明哲学辞典”中关于生产力的定义时，虽然表示“作为一个定义，好得很，无人反对，人人贊成”。但是，他却接着提出質問說：“經驗技能等等，具体究何所指？”事实上，这种否定經驗和技能的說法，本身就是极其荒謬的。因为生产力的改变是随着生产經驗的增长和劳动技能的进步而改变的，是随着經驗技能的不断积累，由量变逐渐发展到质变的。同时，生产工具的改变又反过来影响劳动技能的改进。因此，生产工具与經驗技能具有辯証而不可分的关系。历史上一定阶段的生产工具体现了人类发展到該阶段时，劳动者經驗技能所达到的一定程度，而雷海宗却有意地否定了經驗技能的意义，認為“工具的存在假定技术的存在，技术的存在不一

定假定理想工具的存在”。并且为了证实自己的謬論，他竟然提出“使用石鋸所需要的技术可能比使用鉄鋸还要高”的荒誕不經的例証。我們知道，石鋸是笨拙的，使用起来是困难的，但这只是証明使用者經驗技能的低下；反之，使用鉄鋸的劳动者，看起来似乎輕松容易些，但是，这个劳动者是在过去劳动經驗技能发展的基础上，才比較能自如地来掌握鉄鋸的。雷海宗的这种将人类进化說成倒退的欺人之談，即是为了奠定自己那种否定劳动者在生产中的作用的“生产工具决定論”。

雷海宗是在假借探討学术的名义下，始而否定了生产方式中的生产关系，繼而否定了生产力中掌握經驗技能的劳动者，把人类发展的决定因素归結于生产工具的发展。这样，实际上否定了人民群众在历史上的作用，否定了五种生产方式的社会发展規律，否定了人类历史发展中的階級斗争。归根結底，这都是向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原則进行的一种公然的进攻。

（四）雷海宗以否認奴隶制度的存在来推翻 馬列主义的五种社会經濟形态学說

社会經濟形态发展的学說是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之一，雷海宗对于这个基本原理却抱着明显的敌对态度。他以“生产工具决定論”的謬論，将人类历史划分为石器时代、銅器时代、鉄器时代和机器时代四段，然后又把人类社会发​​展阶段硬分为用石器工具的原始社会，用銅器工具的“部民社会”，